

WENSHI ZHISHI

文史知识



清代的文字狱

周史遗珍须细读——《逸周书》简介

烟草的发现和传入中国

《红楼梦》在苏联

宫刑杂考

十二生肖的来龙去脉

楚庄

缪文远

许子

阮宝山

陈永生

张演生

7

1988





医药学院610 2 01479173

文史知识

1988年第7期

(总第85期)

• 治学之道 •	老生常谈	沈玉成	3
• 文学史百题 •	《诗经》的传统	徐公持	8
• 历史百题 •	清代的文字狱	楚 庄	15
• 怎样读 •	周史遗珍须细读——《逸周书》简介	缪文远	23
诗	诗风三品	王明居	29
文	《东山》的意境创造	何 必	31
欣	慷慨奋藻 独辟蹊径——读张衡《归田赋》	杨炳校	36
赏	明彻达观 新奇真实——读陶渊明《挽歌诗》三首	吴小如	40
• 古代科技漫话(14) •			
	唐宋都城的粮食加工业	梁中效	44
文	古代死刑种种	洪丕谟	49
化	烟草的发现和传入中国	许 子	54
史	先秦独特的挑战方式——致师	祝中熹	59
知	济南乐舞杂技陶俑与汉代百戏	于中航	64
识			
• 金石丛话 •	十三、唐墓志、塔铭、经幢	施蛰存	67
• 文学人物画廊 •			
	李瓶儿与尤二姐——《金瓶梅》、《红楼梦》人物比较	张福庆	70
• 考古知识讲座(6) •	隋唐宋元明考古(上)	齐东方	76

人物春秋	春秋时代非凡的音乐大师——师旷	张怀荣	81
	魏晋名士夏侯玄	李景琦	85
	八方抽丰 一生挥霍——李渔人生的一个侧面	侯光复	88

• 古典文学流派 •	“西昆体”浅谈	张展	92
------------	---------	----	----

• 中国名著在国外 •	《红楼梦》在苏联	阮宝山	96
-------------	----------	-----	----

青年园地	先秦贞节观考略	胡发贵	103
	国风爱情诗中植物比兴的“奥秘”	王志忠 龚际平	106

《坚磨生诗抄》案与弘历的用心

——析乾隆时的一起文字狱	赵伯陶	108
--------------	-----	-----

• 文史信息 •	关于屈原《离骚》的论争 (114)
	略论“咏古诗” (114)
	两周时代的人是如何取名的 (115)

• 读史札记 •	宫刑杂考	陈永生	116
----------	------	-----	-----

俗语佛源	镜花水月 心花 五十三参		
	井中捞月 开山 六根清净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120

• 文史古迹 •	我国古代最早的国家监狱——姜里	李合敏	122
	嘉峪关	林石	102

• 文史信箱 •	十二生肖的来龙去脉	张演生	125
----------	-----------	-----	-----

• 补白 9 则 •	五美四恶 (7)	《诗经》十五国风所属之地区 (14)
	太子惜福 (28)	道生毁宅 (35)
	顾炎武与人书 (53)	
	士子诉试 (63)	苏东坡日享三白 (113)
	海成与《字贯》案 (119)	北人食菱 (124)

老 生 常 谈

沈 玉 成



沈玉成，1932年生，江苏江阴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系攻读研究生，任助教。其后任中华书局编辑，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著有《左传译文》及《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官体诗的兴起和〈玉台新咏〉的编定》等论文多篇。

近年来，我的研究范围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编辑部要我写一点意见，本文就准备以这段文学为基点，谈几点粗浅的体会。

任何研究工作，无非是积累材料和进行思维。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文学的原始材料，研究者要掌握和积累，相对来说，比其他段要容易一些。往上比，搞先秦古籍，如果研究者缺少经学、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严格训练，语言文字关就很难过。材料掌握不确切，就难有新的创获，或自以为有所发现而实际上却像《百喻经》中所说的没有底层建筑的楼房。研究魏晋南北朝，这方面的难度不像先秦那么大，要求可以适当放宽一点。往下比，原始材料的数量较少而且集中。诗文部分，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就几乎包揽无余。即便有新的发现，像最近从方志中辑出的三首谢灵运佚诗，也不过片玉碎金，无关研究大体。史部和子部的专著以及后人对这一段文学的研究成果，较之唐代以后也要少得多。而像去今未远的清代，据钱仲联先生的估计，仅已知的诗

文集就不下七千种。不过多有多的好处，因为谁也不可能看过所有的书，所以只要一旦发现“珍秘材料”，似乎无需乎花多大的气力去研究，也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眼面前摆着有限的人所常见之书，不必多致力于冷僻材料的搜寻，更不必像王重民、孙楷第先生那样远涉重洋去阅读敦煌遗书、孤本小说，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做出成绩的关键在于材料掌握的熟练和思维的深广。

这其实也是“学”和“思”的关系。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为学生总结出了“学而不思则殆，思而不学则罔”的深刻教训。不学，思就是无根之木；不思，学就失去了目的，就只能陈陈相因，无所前进。谈到这个问题，我常常想起陈寅恪先生。这位开创了一代史学风气的大学者，在他的“寅恪按”中，为史学和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多少宝贵的启示。陈先生胸罗万卷，读过许许多多人所少见之书，但他的著作从不矜奇炫博，所引用的材料十之八九为人所常见，结论精深而形式却平正通达，使读者不能不为之心折，不能不感到“确实是这么回事”。然而在叹服之余也自然会想，这些材料自己也曾相识，可就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境界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达到的，因为它是高度的学力、识力和天才汇合的结果。不过后学者应该从中获得启示：陈先生从人们习见的材料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首先是由于他“熟”，其次是“通”。据中山大学的同志回忆，他晚年失明，学生问难请益，他可以告诉你某段材料在某书某卷，屡试不爽。正是在这基础上，他对材料进行排比、分析、综合、判断、联想、推理各种形式的思维，才能“读书得间”，用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从夹缝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我自己研究工作中微小的体会来说，凡稍有所得，道理也概莫能外。比如宫体诗，历来大多认为就是艳体诗，并且举出唐朝人在《隋书·经籍志》、《岑嘉州集序》、《大唐新语》等书中的看法。其实唐朝人的看法和《梁书》作者陈代姚察的理解是有距离的。姚察在《徐摛传》和《庾肩吾传》中明确指出“宫体”是一种“新变”的文体，即诗歌形式。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变化往往互为因果，但内容究竟不等于形式。姚察由梁入陈，由陈入隋，他所生

活的时代正是宫体诗的全盛时代。此中人语，他的意见应该受到尊重。从这一起点出发，对宫体诗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可以有比较准确的理解，从而在评价上也可能更合乎实际。这样的理解固然卑之无甚高论，也未必就能得到专家的承认，但至少，这是掌握原始材料和对之进行思考的结果。离开了可靠的材料，思维的成果就有落空的危险。这还是指比较认真的研究工作而言的，至于摭拾陈说，辗转稗贩，而议论却滔滔汨汨，例如像我见过的严厉批判“齐梁宫体”的文章就不止一篇两篇。宫体的得名在梁代中期以后，哪里来的“齐梁”宫体？诸如此类，就不在讨论之列了。近来读到一篇谈“悟”的文章，强调直觉的“悟”，即“神悟”、“妙悟”。知也无涯，人类的已知只是无边宇宙中极小的一部分。也许有一天，对这种超实践的“悟”如同对特异功能一样，会有学者作出令人信服的证实和说明，不过至少在现阶段，我还是相信先天的以及其他超实践的因素虽然可以影响思维能力，但是正确的思维只能来自实践。具体到文史研究领域，实践的对象就是一堆古书（包括今人的研究成果），不去认真读书，是绝对悟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无论是掌握材料还是进行思维，都需要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多读、熟读之外，积累材料的方法是否正确也至关重要。搞这一段文学的人都钦佩王瑶先生《中古文学史论》所取得的成就。全书二十五万字，几乎涉及了这段文学史中所有的重要现象，作出了极有见地的分析。特别是书中史料的丰富，从《汉书》到《隋书》中的有关材料（当然还有其他书中的史料），凡可以作为论据的，很少遗漏。我没有当面请教过王先生在著作过程中搜集材料的方法，但清楚地感到他有一种竭泽而渔的气概。从迹象上看，他搜集材料不是零敲碎打式的，而是在通盘计划下的全面铺开，即在一次或两次的全面精读之中记录、分类，然后据以取资。我自己在这方面曾经吃过不小的苦头，读书时由于缺乏明确的目的，读得不熟而手又不勤，到用的时候常常要花不少力气去重新翻检。所以，做研究工作，学习、读书、积累材料，注意的方面要宽泛一些，以免顾此失彼。近几年，我在对南朝作家的生平做考证工作时，更加深切地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孤立地考证一个作家，

往往觉得结论颇为可信，但把若干位同时代的作家生平放在一起做横向比较，就会发现孤立考证时所发现不了的问题，再回过头去补苴罅漏，无疑又浪费了不少时间。吃一堑长一智，善于总结经验，人的头脑就可能变得精密。那怕在积累材料这样的初级阶段，就应该注意到材料之间的联系、层次，尽量减少盲目性。

至于进入到思维阶段，方法和理论的指导作用就更加重要了。同一部《红楼梦》，正在热恋的青年会陶醉于宝黛的缠绵，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者却专注于死了多少条人命。前几年在文化界兴起了“方法热”、“观念热”，在大学生里，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等人的理论也是热门的话题。年轻的同志致力于探索，追求新颖，这是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利，用不着去说三道四。这里我只想谈两点想法：第一，理论、方法不论“新”、“旧”，都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指导研究者的思维，目的都在于探索未知，而这一切的基础都应该是原始材料。第二，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害怕“异端”，因为它既然是真正的科学体系，就敢于和“异端”在竞争中见个高低；同时它又是开放的体系，就能够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来发展自己。我个人以为，在方法论上不要党同伐异，而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共存共荣”，互相吸收，互相补充。青年一代的同志使用某些过去所没有使用过的观念、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应当受到欢迎，但是不要把文章写成“今文尚书”，让人读不懂；更不要辞新意旧，辞深意浅，这样很容易招来哗众取宠之讥。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工作，几十年来是有成绩的。但是我个人感到，除了《文心雕龙》、陶渊明之外，研究成绩较多地体现在“面”上或“线”上。前者如王瑶、曹道衡先生对整个中古文学由微观而扩展为宏观的研究，后者如余冠英、萧涤非、王运熙先生对乐府民歌的研究，都是实在的例子。相形之下，对“点”的研究就显得薄弱。另外，长期受到“左”的箝制，研究者的视野还不够宽广，思想还不够解放，对一些重要的课题，比如门阀制度和文学的关系，玄学佛理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渗透在文学中的各种反映，文学观念的转变在创作中带来的崭新面目，或者是探讨不够深入，或者是评价失当。近年来，葛晓音

同志的几篇论文开始注意到了这方面的不足，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巩固并扩大已有的成绩，还有待于更多研究者的努力。

上面的一些意见，大都是老生常谈。然而也不妨从另一意义上来理解：老生，得、失两方面的经验总要比小生多一点；常谈，也许正是经验中可以供人参考的部分，所以常常谈论。老生的经验和小生的锐气应当彼此取长补短，这就是我占用《文史知识》三千多字宝贵篇幅想要实现的一点愿望。

五 美 四 恶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论语·尧曰篇》

〔译文〕子张向孔子问道：“怎样才能治理政事呢？”孔子说：“尊崇五种美德，屏弃四种恶行，这就能治理政事了。”子张说：“什么叫做五美呢？”孔子说：“君子给人民好处而不耗费什么；让人民服了劳役而人民不怨恨；存心仁义而不贪财色；稳重而不傲慢，威严而不凶猛。”子张说：“给人民好处而不耗费什么是怎么回事呢？”孔子说：“根据人民的愿望使人民受益，这不就是给人民好处而不耗费什么吗？选择适合服劳役的情况让人民服劳役，又有谁怨恨呢？自己需要仁德而得到了仁德，还贪图什么呢？君子不管人多人少，不论势力大小，都不敢怠慢，这不也是稳重而不傲慢吗？君子穿戴庄重，顾盼尊严，严肃得使人望而敬畏，这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吗？”子张说：“什么是四恶呢？”孔子说：“不教育而随意杀戮叫做虐；不规劝指导而简单地让人办成事叫做暴；开始松懈，不过问，后又紧急，限期完成叫做贼；同是给人财物，出手吝啬，叫做小气。”

（王雪峰）

《诗经》的传统

· 文学史百题 ·

徐公持

《诗经》在数千年中，被视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其影响至为巨大。在中国诗歌史上，难以找出在影响上与之相匹敌的其他作品。可以说，中国这个“诗国”的诗歌传统是肇源于《诗经》的，《诗经》的传统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占有极重的分量。

《诗经》的传统是个多方面的综合体，因此可以从内容或形式，思想或艺术，创作目的或创作方法等等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诗经》传统中最重要、最本质的方面是什么？我以为有两点：一是尚实的创作取向，二是比兴的艺术手段。

所谓“尚实的创作取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创作思想上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二是在创作方式上具有浓厚的写实倾向。

尚实的创作取向，表现在《诗经》多数篇章中。《国风》诗歌从题材上看，主要有（1）爱情婚姻诗，（2）征夫诗，（3）思妇诗，（4）劳动诗，（5）讽刺丑行诗（如《邶风·墙有茨》、《齐风·敝笱》、《陈风·株林》等），（6）抗议剥削掠夺诗（《魏风·硕鼠》、《伐檀》等可入此类），（7）诉述身世不幸诗（如《秦风·权舆》、《唐风·杖杜》、《邶风·北门》等），这几大类占了《国风》160篇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其关注现实、针对现实的写实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即以爱情婚姻诗来说，它们无论抒情多么热烈，如火如荼，“纯粹的”抒情却极少见，它们大多以描写爱情婚姻的具体活动、具体过程，来显示其情感的发展程度。

与《国风》比较，《小雅》有一多一少。多的是政治批评和训戒诗，它们几占《小雅》全部74篇作品之半；少的则是爱情婚姻诗，只有一、二首勉强作数。最能代表《小雅》性格者，莫过于那些政治批评和训戒作品。这些作品在题材取向上都着眼于现实政治，作者们的创作动机是

由政治现实引发起来的。从作品具体内容看，它们大多是针对厉王、幽王时期的黑暗政治所导致的社会动乱而发，如《十月之交》，从“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写到“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天灾人祸，非常严重。而所以致变异者，原在腐败官僚及艳妃的蛊惑捣乱，诗中列举这些人的名字加以批判说：“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为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楫维师氏，艳妻煽方处。……”诗篇最后写道：“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作者决心要扭转腐败政治，绝不袖手旁观。这样的作者，与其称他为诗人，不如首先将他看作是一位执著的政治家；而这样的诗，无疑是现实性极强的政治诗。

《小雅》里也有不以批判为基调的作品，但写实的倾向则鲜有例外。如《南山有台》是一首以某位“君子”为对象的赞颂诗，“此亦燕飨通用之乐”（朱熹语），诗以“乐只君子，××××”句式结构全篇，而它赞颂的内容是“邦家之基”、“万寿无期”、“民之父母”、“德音不已”、“保艾尔后”等，这些全是从保持政权、家族利益及个人长寿等现实需要出发的愿望，用现代文艺学术语来说，就是浪漫情调实在不多。《小雅》中的燕饮祝贺诗大凡如此。至于农事诗，其重要价值也在于较翔实地记述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制度规模、耕作技术、使用工具、进行过程及收成状况等，以致史学家对它们的兴趣比文学家还高，将它们看作研究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最可靠史料。

再看《大雅》。31篇作品主要包括周民族史诗、政治批评诗、赞颂诗三部分。《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周族史诗一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些作品以记事为主，叙述了周族的发展、壮大，由一个弱小部落到掌握全国政权的历程，具有无可比拟的史学价值。其中几篇尤其是《生民》，除了记述史实外也写及一些上古传说，如写姜嫄履大人迹而受孕生后稷，后稷生下后“不坼不副”，于是“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这些无疑是虚构或经过夸张渲染了的传说，但那些口耳相传了若干代的作者们，他们当时却相信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这些“非事实因素”并不妨碍作者的尚实态度和全

篇总的写实风格。其他如政治批评诗与祭颂文字也同样关心现实、重视现实利益的。

总之,《诗经》的尚实取向是不容否认的。诗歌创作中的这种倾向,实际上是民族心理的反映。它表明,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具有务实的性格。人们早就注意到我国汉民族上古神话相对不发达,对此现象曾有种种解释,其中包括后来儒家对“怪力乱神”的排斥,以及流通过程中的散失等等。这些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还是不能不承认它本来就相对不发达。我们的先民从务实的性格出发,不愿在神秘的王国中驰骋其想像力而流连忘返,他们宁愿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解决人生社会问题的事业中去。“直面人生”的民族性格,决定了神话的不充分发育,也决定了《诗经》的尚实取向。

《诗经》的这一传统,绵延了数千年。无论是汉乐府诗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还是杜甫的“以时事入诗”(胡震亨语),抑或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都是这一传统的延伸。我们看到曹操在诗里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看到杜甫的“三吏”、“三别”,看到王安石在诗里写“兼并”、“省兵”之类的政事,看到陆游写“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等等,是很容易联想起《诗经》来的。过去人们常说“现实主义传统”,对此不少人存有异议;其实,使用某一名词是个用语问题,而中国诗歌确实存在这样的传统,是不存在疑义的。欲把握中国诗歌的特质,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二

如果《诗经》一味“尚实”,那么它的魅力将大为减弱,甚至丧失殆尽,人们只能把它当作一部有韵的《尚书》。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出现,相反,《诗经》中的多数作品,以其特有的感染力,赢得了古今众多读者的喜爱。这种感染力从内容上说来自上古人民的生活情趣,从艺术上说则来自简洁朴素的描绘,来自生动微妙的刻划,来自重章复沓的民歌风,而尤须指出的是,它来自比兴艺术手段的巧妙运用。可以这样说:离开了比兴,也就谈不上《诗经》的艺术性。

所谓“比兴”,实际上还可细分为两部分:“比”和“兴”。“比”即现代

修辞手法中的比喻，对此，在概念理解上不存在任何困难，我们可以径直去体味《诗经》中的巧比妙喻。“有女如玉”（《召南·野有死麇》），这是正比；“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风·柏舟》），这是反比。“有力如虎”（《邶风·简兮》），这是单比，即一个层次之比；“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邶风·谷风》），这是复比，即两个层次之比，第一层次是荼与荠比，新婚与兄弟比，第二层次是荼荠与新婚比。还有一种串比，即一连串的比喻排列在一起：“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卫风·淇奥》），这是连用四个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卫风·硕人》）“螓首”即首如螓，“蛾眉”即眉如蛾，所以这里是连用六个比喻。以上所说都是明比，还有一种暗比，即隐喻，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鹤鸣》），用以比喻与不同之人相处，可以增长自己才德。此外，还有全篇用比者，如《魏风·硕鼠》以硕鼠比剥削掠夺者，《豳风·鸛鸣》以鸛鸣比恃强凌弱者，而以病鸟自喻。由上可知，《诗经》中的比喻形式变化多端，颇为丰富。而从其功能来看，则多具生动效果。以上所举诸例，其实足以说明问题，它们一般都能促进诗句乃至全篇从理念转变为形象，从而加强其形象生动性。“君子”只是一个道德人或社会人的概念，但“如金”、“如圭”之后，他就被增添了光泽和温润的属性，成为一个具体人。《硕人》的“六连比”也很出色，它们都是把人体的某一部位比作某种动植物，从而突出了某种特征。“肤如凝脂”，今人读来已不觉新鲜，但这是被后世许多文人用滥了的缘故，当初《硕人》首次运用这一比喻，实在是个成功的创新，皮肤犹如凝固了的油脂，你想那有多细腻、多光洁！还有“螓首蛾眉”，真亏他想得出来。后来“蛾眉”也被群起仿效而用得很滥了。至于《硕鼠》，则全靠比喻在撑拄局面，我们可以假设把“硕鼠”的比喻从全篇抽出来，那末这篇文字也就只剩下“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几句口号了，这还成其为诗么？

“兴”的情形要比“比”来得复杂。首先在概念理解上就有不少歧义。一般认为朱熹的说法比较正确：“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但必须补充一点：“兴”既然不是“比”，它就不应含比喻之义，唯有

这样，“兴”才有较为明确的界说，不致与“比”相淆。然而，“先言他物”与“所咏之词”之间，也不是一点意念上的联系都不容存在，在某些场合里，它们之间可以有意义上的关联，只不过此种关联比较淡，比较虚，比较远，不那么明确，不那么切近罢了。刘勰说：“比显而兴隐”（《文心雕龙》），“兴”应当在意义上比隐喻更隐才是，否则就是隐喻，而不是“兴”了。从《诗经》的实际情形看，“兴”在诗中除了“先言他物”即用它在音节上开个头这个共同之点外，还有种种不同的作用。大略有以下数种：

一是烘托气氛。《周南·桃夭》是篇贺婚诗，其首章“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前二句“兴”与后二句“所咏之词”并不构成比喻关系，它的作用就是以盛开的光艳的桃花，来造成一种热烈喜庆的气氛。又如《召南·何彼秣矣》，也是婚嫁歌，首章“何彼秣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同样是以盛开的繁花，来衬托婚事的华贵热烈。《陈风·墓门》是首“刺”诗，它的兴就不同了：“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墓门为凶僻之地，荆棘是多刺之物，以此先制造令人不快的气氛，然后正词道出主旨：那家伙很坏，全国人都知道。《唐风·葛生》：“葛生蒙楚，蔕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亦其类。

二是从某个特征上提供联想。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以雎鸠的和鸣来联想“君子”与“淑女”的正相匹配。又如《周南·兔置》：“肃肃兔置，椳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兔置”为捕兔网具，以此联想“武夫”的克敌能力和“干城”作用。

三是从某种意念上提供联想。如《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这是取椒子的多的意思，来联想人的大。多与大虽不属同一类范畴，但在思维取向上有近似之处。《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齐子为女性，与雄狐不成其比。这里是取雄狐求匹的意思，以联想齐子由鲁归来的淫邪目的。

四是这种意义上的关联在若有若无之间。如《邶风·柏舟》：“汎彼

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前二句兴词与后二句正文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关联，但细加体味，似乎又有一些相关，兴词描绘出一幅“野渡无人舟自横”的画面，这里面似乎隐含着一种失落感，它与下文的“如有隐忧”是否在暗暗地呼应呢？

五是隐语式的意义关联。闻一多先生曾考出《诗经》中凡说及“鱼”者，多与两性关系有关。如《齐风·敝笱》：“敝笱在梁，其鱼魴鰈。齐子归止，其从如云。”兴中写鱼，就在暗示“齐子”之归涉及男女关系。又如《陈风·衡门》：“岂其食鱼，必河之魴？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卫风·竹竿》：“簌簌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邶风·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威施。”等等，皆有此种文字意义之外的意义。

六是无论文字内外，皆无任何意义关联，兴词只是画出一幅图景或写出一个意境，扩充了诗篇的总内涵。如《秦风·晨风》：“𪔐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唐风·山有枢》：“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郑风·扬之水》：“扬之水，不流束楚。终鲜兄弟，维予与女。……”皆是。

细析起来，还可以分出若干种。总的来说，“兴”通过烘托、渲染、铺垫、联想、暗示等途径，给诗篇增添了气氛，加多了色彩，扩充了意境，丰富了内涵。又由于“兴”都具有淡、虚、远的特点，它们又都使诗篇呈开放性形态，并给作品带来一种冲淡虚胜之美。与“比”相较，“兴”更具《诗经》特色，更具民歌风，更能代表我们先民的文学创作心理和欣赏习惯。“比”“兴”的广泛运用，提高了《诗经》的艺术品级。而《诗经》中《国风》部分比兴最多，艺术价值也最高，《雅》次之，艺术价值也次之。《颂》比兴甚少，显得质木无文。

从《诗经》开始的比兴传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重要的艺术传统，后世诗歌，无论是里巷土风还是文人雅制，都极为广泛地，又自然而然地运用比兴手段，来构撰作品，而许多优秀诗篇，往往与比兴有着不解之缘。“大风起兮云飞扬”，“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锦瑟无端五

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用不着我来举出篇名和作者名字，大家对它们都很熟悉，而它们也都在印证着《诗经》比兴传统的存在和发展。

一个尚实取向，一个比兴手段，二者相结合，就形成《诗经》传统的主体。它们的结合，是精神内核与表现特质的渗透和互补，是实与虚相生，是质与文相成，它与我们民族的性格相契合，由此演成万古不废的艺术传统。

《诗经》十五国风所属之地区

《周南》、《召南》主要产生在南方，包括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作品，它的采风范围达到河南临汝、南阳和湖北的襄南、宜昌、江陵等地区。

《邶》、《鄘》、《卫》三种国风实际上属于同一个地区，也就是原来殷商的首都地区。邶、鄘原来虽也是封国，但不久即并入卫国了。它所涉及的地区，包括今河北的磁县和河南的安阳、淇县、滑县、汲县、开封、中牟、濮阳等地区。

《王风》是指在王都，即今河南洛阳附近所采的诗歌。其范围大致在今孟县、沁阳、偃师、巩县、温县等地区。

《郑风》《桧风》产生在相近地区。两国领地相连，桧为郑所灭，其地相当于今河南郑州、新郑、荥阳、密县等。

《魏风》的魏并非战国时的“魏国”，而是古魏国，在今山西芮城东北，后来并入晋国。《唐风》的唐是晋的前身，在今山西翼城、曲沃、绛县、闻喜等地。

《齐风》来自春秋时的齐国，即今山东省大部分地区。

《秦风》、《豳风》产生在秦国和豳国，其地在今陕西省境内。豳地就是现在的枸县和郃县。

《陈风》产生于陈国，其地在今河南淮阳、柘城和安徽的亳县。

《曹风》产生于曹国，其地在今山东西南部之曹县、菏泽、定陶一带。

(南治平)

清代的文字狱

· 历史百题 ·

楚 庄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专制主义，是政治上以君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历代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一方面通过“以吏为师”、“独尊儒术”、“开科取士”之类的手段驱使或诱使人们进入钦定思想的彀中，另一方面又通过“焚书坑儒”、“文字狱”等手段对越出或可能越出钦定思想圈子的人进行镇压。封建专制主义这两手的互相配合和交替使用，都是为了钳制思想、统制文化，保证政治上定于一尊。而其中的文字狱，更突出也更集中地表现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横暴、凶残和卑劣。

所谓文字狱，是指封建统治者以人们撰写或保存的文字、著述中的问题为借口对当事者和有关的人用刑、定罪、杀戮、诛连的案件。尽管这类案件往往另有更复杂、更深远的背景或原因，但都是从文字引发并以文字罗织成罪的，所以后人称之为“文字狱”。文字狱历代都有。如汉代杨恽因《报孙宗会书》以大逆被腰斩，宋代苏轼因乌台诗案以讪谤获罪下狱，明代高启因《上梁文》以谋叛被杀等等都是。而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文字狱频繁发生，愈演愈烈，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是空前的。特别是乾隆一朝，兴文字狱几乎提到封建国家政策的高度，成为封建皇帝进行封建专制统治经常采用的主要政治措施之一。

关于清代文字狱，首先应该谈到搜缴和禁毁“遗书”、“禁书”。早在顺治时就曾下诏“访求遗书”，康熙时下令“购求遗书”，乾隆时更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在全国范围内收缴“违碍书籍”，在四库开馆期间十年内奏准禁毁书近三千种，总数在十万部左右。另收缴销毁书板五万余块。在这个过程中，皇帝一再严令“实力查办”、“切实搜查”、“务期净尽”、“民间尚有违禁潜藏者，……除将本人治罪外，仍惟该督抚

是问，恐不能当其罪也”。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加上官吏为固宠邀功或营私渔利，民间所受骚扰和迫害的酷烈。这应该是全国范围的牵涉面最广的文字狱。但这些方面的情况没有留下很多记载（这也正是文字狱政策的结果）。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有关清代文字狱比较详细的材料，主要是作为专案纪录在封建朝廷档案里的案例，还有些散见于公私文书中的，总计逾 100 案。至于历朝奏本或作文因“文理荒谬”、“应抬之字竟不抬写”、“妄用不应用语”、“所言不惬朕心”、甚至超过字数“违例”而获谴得罪的，更是不胜枚举。我们仅就部分案例对清代文字狱的某些方面作些初步的考察。

首先，我们通过所知案例来看清代文字狱要达到的政治目的。

一般地说，历代文字狱都是为了打击政治上的反对力量（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士”这一阶层中的异己力量），维护封建王朝的思想控制和政治统治。但作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制造文字狱却又有它侧重的某些特点。

一、对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镇压。检阅已知案例，真正系统鼓吹反满的只有雍正六年曾静传布吕留良遗著一案。湖南人曾静得明末清初理学家吕留良（已在康熙二十二年去世）遗稿，著书宣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人与狄夷无君臣之分”，并派学生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被岳告发。结果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徒严鸿逵被剖棺戮尸，子吕毅中、徒沈在宽被斩首，妻女子孙流放为奴，所有刻印收藏吕留良书稿的也都被处死。雍正还自撰长篇谕旨，和曾静的“悔罪供词”等合刊成《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雍正除了自辩其继承帝位的合法性，以打击皇族内部的反对派外，主要是强调君臣伦理，“不得以华夷异心”。从雍正不惜以皇帝之尊自著长文与囚徒的“谬说”哓哓辩论这一异常的举动上，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对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警惕和重视。

又如乾隆四十五年戴移孝案：安徽贡生戴世道的高祖戴重、曾祖戴移孝、祖戴昆数十年前刊刻过诗集，其中“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之类的句子被认为“悖逆”，结果除死者戮尸、子孙缘坐处死、妻“给功